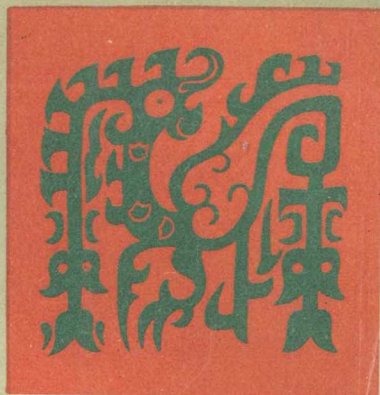


张碧波 著



GUO WEN XUE SHI LUN

国文学史论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论

● 张碧波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5 号

中国文学史论

张碧波 著

责任编辑：高质慧

封面设计：李 森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 1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3·插页 2·字数 300 千

1993 年 3 月第 1 版·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16-1825-7/I·53 定价：6.00 元

文学史研究断想(代序)

目前,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人们开始提出宏观研究,开始注重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这是个可喜的开端,说明中国文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勿庸讳言,建国以来出版的几部著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些著作大都以经济形态的变化和统治政权的更迭作为断代标准和史学体系,把当时代的文学现象仅仅看作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反映的结果,文学历史便成了每个具体的历史时代及其所决定的文学现象拼加在一起的“汇集”,这种对反映论的片面理解,这种孤立的停止的非联系性的简单罗列的方法,不可能把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当作一个连续性的、具有趋向性的系列,不可能揭示各种文学现象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也不可能从它们的内在联系中看到文学的发展趋势,当然也就不能根据它们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作出的科学评价。这些著作往往以文学与政治、作家与现实、世界观与创作、形式与内容、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理论范畴作为分析评价标准,重点分析评价了作家及其作品,这样,作家论,作品论就成了文学史的中心,文学史也就成了一条作家作品积累的没有内在逻辑的表面现象的单线,这样一条单线不可能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体过程,不可能揭示中国文学的特点,也不可能揭示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

中国文学中有很多文学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索,需要深入探

讨。诸如：

中国文学为什么抒情诗特别发达，而叙事诗则相对不发达？

为什么在唐宋之前诗歌、散文特别发达，而小说、戏剧却是在唐宋之后方繁荣发展起来？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为什么现实主义特别发达，而浪漫主义则相对的不发达？

为什么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是以美刺讽谏为其主要特征，浪漫主义是以怀疑批判为其主要特征？

为什么我国古代作家大都是政治家、思想家，而专门职业作家很晚才出现？

为什么我国古典小说是章回体，古典戏剧是音乐、舞蹈、诗歌密切结合的综合艺术？

为什么我国古代文学以意境说作为基本的审美观念，而欧洲则是摹仿说、典型论？

凡此种种，已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没有能够做出合理的说明。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文学史学科，它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的规律和特殊的发展途径的科学。它从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整体性的角度研究古代作家的全部创作，对古代文学流派作发展性的研究，在整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作断代研究，并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各个阶段的内在联系及其所反映的发展趋向。这就是说，文学史所研究的不是分散的、孤立的文学现象，不是局部性的、阶段性的问题，它所研究的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材料，它所研究的也不是文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中国文学史是在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基础上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艺术传统的产生、发展及其各阶段的特征，揭示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向，最终揭示中国文学

发展的特殊规律。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学中到底有些什么规律？都有哪些特征？我们认为中国文学是有它自己的特征和特殊的发展规律的。例如：

中国文学的鲜明的政治功利性质和教化观念；

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艺术传统；中国古代抒情诗有着浓重的叙事因素，叙事诗有着浓重的抒情因素；

我国古代散文表现出由实用性向文学性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剧的繁荣发展大大晚于正统的诗歌、散文；古典小说、戏剧表现出抒情的、写意的抒情艺术与叙事艺术相结合的民族艺术特征。……

当然，极为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绝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就能将它的特征说清楚的，也绝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就可以揭示其发展规律的，我们只是为了引起讨论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罢了。这说明，在我们把握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的总体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去探索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去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

建立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体系是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过去我们只是有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我们并未真正或未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是以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取代了它。过去我们只注意微观研究、局部研究，很少注意宏观研究、整体研究。今后我们应在宏观研究上投入更多的力量。在宏观研究、整体研究时要吸收各种具体的微观的研究成果，而在局部的具体的研究时必须要有整体观念，要从宏观角度统摄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微观研究、具体研究是整体研究、宏观研究的基础，但不应停止在这一点上，应把多方面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上升到理论，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应从作家作品的整体性的研究中总结出中国文学的特点、民族艺术

传统及其发展规律来。

打破单科研究传统，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文学史上下五千年，时间漫长，作家众多，文学现象极为丰富、极为复杂，它和中国的历史、民族发展、宗教、哲学、史学、政治、经济以及各种艺术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要研究它的特点，探索其发展规律，必须各学科通力合作，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结合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宗教史、哲学史、自然科学史、农民战争史、民族文化史、音乐史、艺术史以及外国史的研究，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打破小农规范，方能把中国文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与发扬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优良传统，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合理的、有益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迅速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体系，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推进一步。

1983年

目 录

文学史研究断想(代序)	(1)
历史·文化·文学	
——关于中国文学基本特质的探讨	(1)
文明史初期的文学史论	(24)
史诗·抒情诗·叙事诗	
——论我国古代抒情诗发展中的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37)
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55)
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	(68)
古典现实主义论略	(79)
中国古代浪漫主义传统诸问题	(99)
庄子与古典浪漫主义论略	(120)
从《诗经》到《楚辞》	(144)
先秦散文论略	(159)
封建史初期的文学史论	(185)
汉代文化与汉代文学	(200)
中古文学史论	(227)
唐诗的三次美学论争	
——兼及唐诗流派兴衰演变规律问题的探索	(256)
佛学与中国文学家	(277)
词学三论	
——关于词体文学艺术传统的探讨	(299)

苏轼与后期浪漫主义	(316)
小说史论(一)	(346)
小说史论(二)	(361)
评点派	
——小说理论史上一个美学流派	(374)
论马克思主义方法体系在古典文学宏观研究中的	
运用	(392)
后 记	(407)

历史·文化·文学

——关于中国文学基本特质的探讨

民族历史是民族文化的土壤，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精英。把握民族文学的基本特质，对理解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民族思维特征至关重要。所谓民族文学基本特质，包含两个互相关联的内容：一是构成文学民族特征的质的规定性；二是对这质的规定性的高度集中和抽象。对它的探讨，首先要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在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见出民族性的鲜明；其次要将其置入民族文化史的框架之中，在其生成和发展机制的描述中找出独特性的根源。从而为民族文学基本特质在民族文化史和世界文学的纵横坐标系上找到恰切的位置。

笔者认为，中国文学基本特质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精神结晶，是民族生态环境、民族文化选择、民族思维方式、民族价值观念所构成的“巨系统”的产儿。它可简要概括为：一、简洁凝炼的形式与丰富复杂的内容的统一；二、理性涵盖下非理性意识的多层次表现；三、重表现抒情不重再现模仿；四、重情理谐一不重哲理反思。笔者相信，通过对上述四方面内容的具体阐述，不仅可以勾画出中国文学基本特质的面貌，而且能加深对东方文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东西方文化互补而构成人类文明的理解，揭示出把中国文化视为“酱缸文化”、“奴性文化”等论调的可笑与荒唐。

一、早期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封闭性——
原始的有机自然观——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
性、整体性、综合性特征——简单凝炼的形式
与丰富复杂的内容的统一——比兴、用典和
意境。

把中西文学作一直观比较，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文学主体的诗歌虽然有比欧洲更长的历史，比欧洲更得宠的地位，但在规模体制上，不仅在文学的不自觉时代没有产生《伊里亚特》、《奥德赛》那样的鸿篇，即便在自觉时代也找不出如《失乐园》、《浮士德》之类的巨制。漂浮在中国诗海之上的，是一叶叶小巧玲珑的轻舟，而复杂的心绪动荡、深沉的忧患意识、细腻的桑濮之情、宏大的宇宙之思，无一不在精巧的形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现。简洁凝炼的形式和丰富复杂的内容的统一的确是中国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

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中国文明是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都密集在这一带。从地理环境上看，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有着松软肥沃的土壤和广袤丰盛的草木，前者适宜于灌溉耕作，有利于最早的粮食作物黍稷的生长，后者则为原始先民筑巢定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于是中国最早的农耕者和农业村落便在此诞生，并逐渐创造出和古希腊“海上文明”截然不同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内陆文明。它在经济上，是和自然的节令变化同步，以稳定、封闭、循环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在思想观念上，祈求风调雨顺，惧怕变化动荡，追寻安全平稳，注重人际关系，视人为的传

统为天经地义，对来自其他文化圈的信息即便不完全排斥，也必须透过一层层邻近民族的文化层的过滤、渗透、变形间接吸收；在心理素质上，缺少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冒险求成的精神，对自然力量和人际整体的依赖感和亲切感，积淀成固守传统文化框架的惰性和对权力、观念的盲目依附。这和航海民族擅长贸易，重视技术，生活周期短，频率快，收获随机性大，冒险性强，在危险的海盗生涯中不断认识到独立、自由的价值，在广泛的贸易旅行中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的有利因素，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早期农业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使古代的中国人较多地认识到群体力量的伟大及群体内部调节的重要，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自然界内部构成的精细把握和逻辑分析，保留了一种强调自然界整体及事物之间内在关系的原始有机自然观。从最古老的图腾崇拜和原始神秘的集体表象到天人浑然一体的万物有灵论，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始终保持着直观猜测和朦胧意识的特点，未能形成如西方那样以实验分析、分解比较和归纳推理为基本方式。静止、孤立、片面地考察事物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这样，中华民族在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历史进程中，就表现出重整体把握不重局部分析，重互相关联不重单一考察，重直观领悟不重实验确证的总体特征，形成以整体性、综合性、模糊性见长的传统思维方式。

例如，在对物质结构问题的探索中，《尚书·洪范》提出了著名的“五行”说，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也提出了类似的“四根”说，但希腊自然哲学对宇宙始基的思想，沿着对亚宏观现象分析思考的途径，很快就转向原子论，而中国古代关于物质结构的理论却沿着整体综合的方向发展，提出了一个笼统的道、气观。原子论比“四根”说更加逼近真实，道、气观却比“五行”说更为抽象和概括。中唐时的刘禹锡曾以“空者，形之稀微者也”的命题，肯定了

“空”也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但这一命题始终停留在哲学的高度，没有人再具体从科学的角度去论证“稀微者”为何物和为何“稀微”。王夫之对燃烧现象有过“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特稀微而人不见尔”，“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的描述，这已经认识到物质的不灭和转化，但无论他或后人，都不曾象波义耳、斯塔耳、拉瓦锡那样对燃烧进行化学的解释和定量分析，更不要说揭示科学的能量守恒定律了。

早期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封闭性，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整体性、综合性特征，给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染上了奇异的东方色彩：缺乏明晰的纵向穿透，长于模糊的横向关联。产生于商周之际的《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不受阴阳总规律的制约，固然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万物都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变化这一认识的最高概括。但“阴阳”这一对概念在后世的运用几乎达到“滥”的程度，举凡两性差别、昼夜交替、寒暑变化、天地日月、生老病死、君臣夫妇、艺术风格、用药炼丹乃至电、磁场、火药、地震，无一不可以用阴阳以解释之。这种注重事物间横向关联，注重对事物进行综合整体把握的模糊认知模式，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中国文学的第一个基本特质，简洁凝炼的形式与丰富复杂的内容的统一。

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的简洁凝炼是有目共睹的。诗歌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仍以五、七言为主、四、八句居多。而当五、七言句式基本固定，没有人会相信九言、十一言能有取代它们的力量时，于不变之中求变，于变之中求不变的格律诗便迅速兴起、定型、兴盛并历久不衰。格律诗在平仄、韵脚、字数、句数、粘对诸方面的严格规定，以形式诸要素的优化、固定化为原则，实现了诗歌这种文体在表现形式上最大限度的简洁和凝炼。其后继起的词牌和曲牌，则更宛如一个个不同规格的精巧“鸽笼”，文人的

潜力便表现在于不变的“鸽笼”之内翻出前所未有的新花样。小说和戏剧因体裁所致，不可能如诗、词、曲那样建立严整的形式规范，但由于中国小说和戏剧是在悠久的诗歌传统之上发展起来的，诗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规范都在其中留下或明或暗的痕迹，甚至直接成为小说、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小说一以贯之的章回结构，整齐对偶的回目，留有悬念的回尾，简历式的人物交代，概括的景物描绘，画龙点睛式的心理刻画和性格展示；中国戏剧成套的唱腔，有浓郁诗意的唱词，打破时空局限的舞台动作和造型，脸谱化的人物形象，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中国小说和戏剧追求简洁凝炼的历史轨迹。

但形式的简洁凝炼同内容的丰富复杂往往存在矛盾，而作品容量的深广度又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学发达程度的标志，于是，如何用简洁凝炼的形式表现出丰富复杂的内容就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比兴手法和典故的运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早努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文学的想象空间，较之单纯的“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但“比兴”仍属单一对应、具体明确的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它能“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却难以对那些深邃的人生哲理和复杂的情绪体验作出恰切的表述；典故能增加作品的容量，多用则容易呆板、晦涩、枯燥，难以产生审美效应。它们在解决上述矛盾时，都有成效也都不理想。只有“意境”理论的出现，才标志着这一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开始。

意境亦称“境界”。当皎然第一次把“境”的概念引入诗歌理论时，虽然明显地借用于佛经的法相唯识之学，但也仅仅是概念的借用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意境”理论源于佛学。因为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早已从思维方式、表达习惯、艺术创造、艺术鉴赏诸方面为意境说的诞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铺

平了发展的道路。从老子的“无言之美”、庄子的“得意忘言”到《周易》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从书法家王僧虔“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到画论家谢赫“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从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到刘勰的“义生文外”，都强调能诉诸视觉和听觉的形质、语言本身的微不足道，强调艺术超越形质、超越语言的高层次本体特征。在这些艺术理论家们看来，构成书法的墨迹，构成绘画的线条，构成诗歌的语言，都不过是审美过程的操作手段，就象捕鱼的“筌”或捕兔的“蹄”一样，一旦鱼、兔到手，“筌”、“蹄”便毫无用处。当人们在艺术品面前进入审美体验，领略到审美情趣之时，墨迹、线条、语言等物质形式便在人的审美知觉中失去了单独存在的意义，占据人心灵的，是由物质形式引发，主体心理创造，主体和客体互相纽结的一个网络，一个为心理张力控制的具有一定疆界的心理生活空间。所以，从本质上说，意境理论的出现，是重神似轻形似，重情感逻辑轻理性逻辑，重主观真实轻客观真实的传统艺术思维方式的必然，其后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士禛的“神韵”，王国维的“境界”，都是对此合乎逻辑的深化和发展。

意境追求以心理体验为主的精神实体，追求“惚兮恍兮”、扑朔迷离的神韵，具体到作品，就要求其结构和内容都要给读者留下驰骋的心理空间，能产生超越各部分具体属性之和的新质即“韵外之致”，具有属于各部分形体之上又统摄各个部分的整体精神。因此，酷肖逼真、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冗长纷繁的作品均无从产生意境。而简洁凝炼的作品因采用内涵不确定的模糊的全意象或数个脱节、叠加的意象，使读者借助自己的心理能量在缺乏直接逻辑关联的若干个散点间构筑起属于他个人的心理场，在言语空白处进入审美活动的佳境，反倒有限的形式中实现了心理

上的无限。

意境使简洁凝炼的形式在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容上成为可能，反过来又促进形式进一步向简洁凝炼发展。尽管意境理论产生较晚，但严格说来，意境并非人们在解决形式和内容矛盾时寻到的出路，它和简洁凝炼的形式共同成为传统文化开在文学领域的一枝并蒂莲。

二、整体主体性的强调与群体意识的主宰地位——宗法观念的形成与宗法等级秩序的建立——个体主体性的涌动与中国文化心理的分裂——理性涵盖下非理性意识的多层次表现——构思、表达、欣赏上的直觉体验与主观感悟。

中国文学发展中有两条纽带在一起的线索，一条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和理性控制；一条以庄、玄、禅思想为基石，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和无意识规律。前者以正统身份自居，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但理论和创作总不免单调、苍白；后者生于“草野”，播于“江湖”，虽无居“庙堂”之荣，但春雨润物，星火燎原，很快便以庞大的作者群和众多的优秀作品蔚成大观。这种情形，表现出中国文学的又一基本特质：理性涵盖下非理性意识的多层次表现。而对其产生原因的探讨，就不能不追溯到中华民族在人的主体性确立之时的特殊性。

人类在建立社会之初，就面临着需要解决或协调的两大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它使人的主体性具有

双重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是作为类的、理性的、一体化的整体主体性出现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是作为个人的、感性的、多元化的个体主体性出现的。由于中国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农业型内陆文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较少体现为如古希腊航海贸易中的个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多体现为作为类的整体和自然的关系，所以，封闭、稳定、内部结构相对简单的早期农业社会使人们较多地认识到整体主体性的优越并特别加以强调，形成靠神秘的集体表象约束个体自由的氏族血缘集团。在这个集团内部，群体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宗法的群体意识也凛然不可侵犯，处于支配个体的核心地位。而中国古代采取“维新”的路线从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过渡时，以氏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和群体意识不但没能如古希腊那样受到发达的工商业、农业和繁荣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冲击，反而被人为地强化，形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加完备、丰富、繁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宗法制度扼杀人的个体主体性，用“礼治”统治的方式，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每个人从小到大，从生到死，从家庭到社会，从日常起居到人际交往，都被束缚在既定的格式之内。它象混凝土一样，把充满空际和活力的立体网状社会结构浇铸成僵化的板块，泯灭了人的自由天性。为征服自然而形成的人的整体主体性蜕变成强化少数人统治地位的工具。强调理性整体的社会本位论在东方文明诞生伊始，便以不完全的畸型状态获得绝对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的特殊途径，延迟了社会意识形态自觉时代的来临，也使不自觉时代的文学在尚未意识到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时，便被人为地遮在政治的羽翼之下，戴上了只准单向发展的枷锁，以强烈的实用功利性和政治功利性，成为宗法观念的承载形式和礼治统治的辅助手段。如果说，古希腊的文学在产生之初，